

醴陵瓷

田 申 编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 谨以本书纪念醴陵釉下五彩瓷器创烧100周年
◎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品
◎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L I L I N G C I

3527
2019/0

- ◎ 谨以本书纪念醴陵釉下五彩瓷器创烧100周年
- ◎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品
- ◎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醴陵瓷

田 申 编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L I L I N G C 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醴陵瓷/田申编著.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5356-3568-6

I. ①醴… II. ①田… III. ①陶瓷—工艺美术—简介—

醴陵市 IV. ①J5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21550号

醴陵瓷

责任编辑: 李 坚

责任校对: 周万里 彭 慧

编 著: 田 申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深圳佳信达印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观光路128号库坑路广澜工业园

开 本: 635×965 1/8

印 张: 45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3568-6

定 价: 398.0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84787105

邮 编: 410016

网 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731-88807990

百年之路

(代前言)

自醴陵正式启用“大清宣统元年”款识至今，刚好一百周年，在釉下五彩创烧百年华诞的吉祥日子，谨将本书奉上。

百年时间对陶瓷历史而言，实在不长。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百年却意义深远，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醴陵瓷业也伴随着历史的脚步走过了百年之路。

关于本书的定名，曾征求过许多人士的意见，经反复研讨，最后还是依陶瓷研究和收藏领域的称谓习惯，以窑口主要工艺特征诞生地名定名为《醴陵瓷》。

根据考古发现，醴陵在东汉已开始制陶，宋、元时期生产瓷器，陶瓷生产历史悠久。本书以醴陵近代瓷业发展为主线，从时间跨度上分为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新中国成立至1998年；1998年至今三个大的阶段并分别对它们进行叙述。这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转型时段，醴陵瓷业伴随着社会变革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是一段屈辱的历史。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外国列强的侵入，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各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割地赔款，出让路权，设立租界，丧失海关利权，甚至被迫准许洋人在中国土地上行使裁判权，中国真是受尽凌辱。特别是被迫对外设立通商口岸后，“洋货”随之向中国内地大举倾销，中国民族工业日渐衰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熊希龄等一批有识之士在“实业救国”的呼声中创立了“湖南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引进日本近现代制瓷工业技术，聘请景德镇技工和一批中国传统画师，创烧出清新雅致的釉下五彩瓷器。

釉下五彩装饰工艺，是在近代颜料化学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创烧而成。它突破了传统釉下最多为三彩的单调格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色彩缤纷的装饰画面，令人耳目一新，在创始之初的五年内连续四次获得国内外各种劝业会、博览会大奖，一时誉满天下。醴陵瓷业仿佛展现出一片美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在旧中国腐败的政治局面下，美好的前景很快被军阀混战的硝烟冲散，釉下五彩工艺几乎遭到灭绝。新中国成立后釉下五彩工艺得到抢救性恢复。醴陵瓷业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呈现出当今的良好局面。

回顾百年历史，醴陵瓷业的多舛命运无时无刻不随国家的脉搏而跳动。历史的经验要总结，历史的机遇更应把握。在改革开放的大好经济形势下，相信醴陵瓷会更加绚丽多彩。

2009年11月10日 田申

沿革

醴陵市位于东经113度、北纬27度。东面与江西省萍乡市毗邻，是湘东门户。

醴陵在春秋、战国时属楚国；秦朝时属长沙郡；西汉高祖刘邦立国五年时（公元前202年）属长沙国；汉高后吕雉统国四年时（公元前184年）置长沙侯国，封长沙相刘越为醴陵侯，食六百户。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醴陵的地名，刘越也可算得上醴陵的第一位领导者。

东汉初年，正式置醴陵县。以后虽朝代更迭、历经分属，两千多年来醴陵地名从未改变。

三国时期，醴陵属吴国荆州郡。南北朝时醴陵属长沙国。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封江淹为醴陵侯。陈时期废帝陈伯宗光大元年（567年）封淳于量为醴陵公。隋大业三年（607年）撤浏阳、醴陵二县并归长沙县。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621年）恢复醴陵县。五代十国时期，醴陵属马殷楚国的潭州。宋代时属荆湖南路潭州。元代元贞元年（1295年）升为醴陵州治。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改醴陵州复为醴陵县。清代时，醴陵县一直属长沙府。

民国元年（1912年），湖南分为湘江、衡阳、武陵、辰沅四道。醴陵属湘江道。民国15年（1926年）全省划为九个行政区，醴陵县属第二行政区管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醴陵县属长沙地区。后划归湘潭地区管辖。1983年醴陵划归株洲市管辖。1985年醴陵县改设醴陵市。

醴陵市全貌



目 录

第一章 昔日的辉煌 9

- 1-1 醴陵近代瓷业先驱——熊希龄 10
- 1-2 湖南瓷业学堂 17
- 1-3 湖南瓷业公司 25
- 1-4 醴陵釉下五彩瓷清末民初时期的四次获奖 39
 - 武汉劝业会获金质奖牌 40
 - 南京“南洋劝业会”获一等奏奖 41
 - 意大利“万国制造工艺赛会”获最优奖 48
 - 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获金牌奖 50
- 1-5 湖南模范窑业工场 54
- 1-6 瓷业兴衰 57

第二章 瓷业的新生 69

- 2-1 瓷业的新生 70
- 2-2 釉下五彩工艺抢救恢复之路 78
- 2-3 步入现代工业体系 84
- 2-4 为毛主席制瓷 93
- 2-5 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用上胜利杯 99
- 2-6 为周总理制胜利杯 102
- 2-7 “三馆瓷”的研制与生产 104
- 2-8 承制“国宴”用瓷 108
- 2-9 毛主席纪念堂用瓷 119

2-10 鲜为人知的“118厅”餐具	122
2-11 绚丽多彩的国宾礼品瓷	124

第三章 继承与发展 127

3-1 悄然而至的变革	128
3-2 前进中的新兴企业	137
研究所	141
企业	142
3-3 艺术家喻略	166
部分已故艺术家小传	166
部分六十岁以上艺术家简介	174
部分中青年艺术家简介	192
3-4 醴陵瓷业教育	226

第四章 工艺与鉴赏 233

4-1 釉下五彩工艺的重要意义	234
4-2 款识	241
纪年款	245
地名款	250
公司、厂、机构款	252
人名款	260
4-3 器型	266
瓶、尊、罐、缸	268
壶、盏、杯及套具	280
碗、盘、碟及成套席具	284
文具	285
瓷塑	286
瓷雕	299

4-4 窑具	300
窑	300
匣钵	302
火照、色片	304
垫饼	305
4-5 工艺	307
釉下五彩工艺	308
分水工艺	314
皮印墨线	315
贴花工艺	315
金水制备	317
模具成型	318
4-6 鉴赏	321
4-7 醴陵釉下五彩工艺对其他地区的影响	346
萍乡窑	346
台田窑	346
界牌窑	348
洪江窑	349
石湾窑	351
附 录	352
附录一：《熊希龄为湘省创兴实业推广实业学堂办法上端方书》 ...	352
附录二：《熊希龄为创兴醴陵瓷业呈端方文》	353
附录三：《沈明扬关于裁撤厘金改收统税以维磁(瓷)业提议案》 ...	357
参考文献	358
后 记	360

第

一

章

昔日的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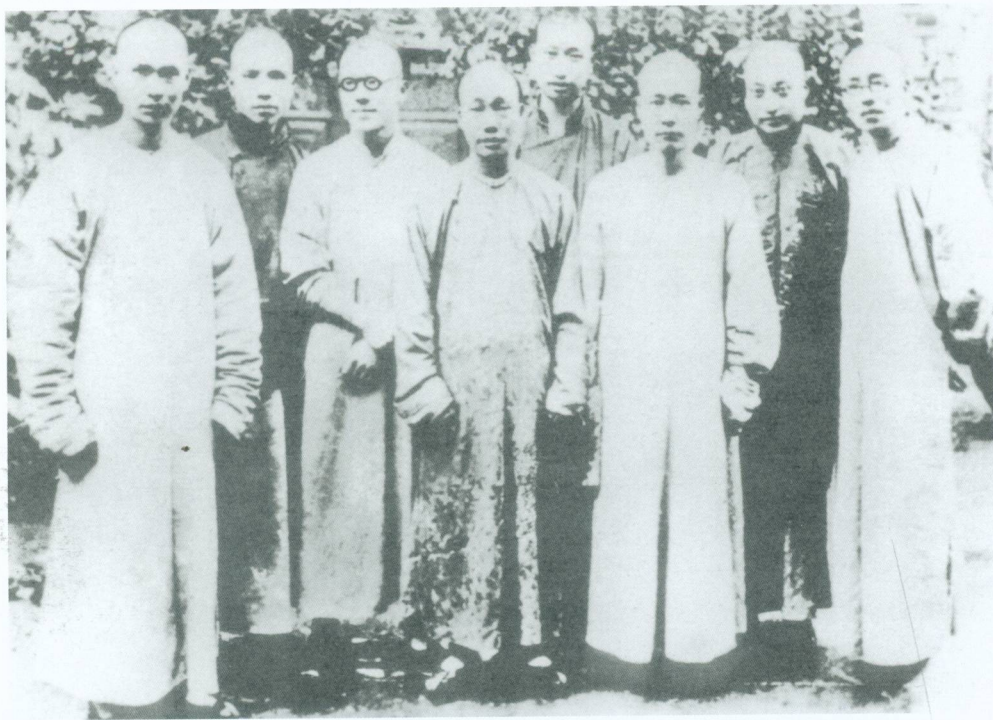


1-1 醴陵近代瓷业先驱——熊希龄



图1-1 熊希龄青年时期。(1907年)

图1-2 长沙时务学堂部分教习合影，左起：叶觉、谭嗣同、王史、欧渠甲、熊希龄、韩文举、唐才常、李维格。



在中国近代史上，熊希龄是个著名人物。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出生在湖南西部山区的凤凰县，所以常被人们称为熊凤凰，另外有表字叫秉三。熊希龄青少年时代人们就称其“素有才名”，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随后选翰林院庶吉士，时年22岁。(图1-1)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光绪皇帝“兴学堂，开言路”的思想指导下，支持熊希龄与谭嗣同一道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熊希龄任学堂提调，掌管学堂行政事务，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这所学校坚持以维新思想为办学宗旨，培养出一批思想先进的维新志士。著名的护国讨袁将领蔡锷，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时务学堂是熊希龄参与创办的第一所学校。(图1-2)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一月，熊希龄又与谭嗣同、唐才常一起创建了南学会，紧接着两个月后他们又创办了《湘报》，这些都是当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同年七月初三日(1898年8月19日)熊希龄接到了光绪皇帝准备召见的电报“迅速来京，预备召见”，正准备起程之时却突发疾病，不能成行。谁知9月就在北京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戊戌政变”，慈禧太后诛杀

了谭嗣同等“六君子”，熊希龄侥幸免一死。10月，朝廷降旨以“庇护奸党，暗通消息”的罪名，给熊希龄“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此后一直闲居在家。陈宝箴也因被此革职。(图1-3)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事件后，清政府迫于列强压力，答应在全国开放市场，便于洋人通商。湖南从岳阳起渐至长沙、湘潭、常德等地陆续对外开为商

埠，于是大批洋货倾销内地，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对湖南更加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其中瓷器以日本、英国居多，大量运往中国，挤占市场。直到现在，仍能偶然见到当年的一些日本、英国的产品。外货的涌入，致使湖南省内各业纷纷遭受打击。醴陵土瓷业所受冲击更大，正如熊希龄所言“近年以来，土货滞销，窑户赔累几至歇业，皆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图1-4、图1-5）

晚清政府不甘心坐受洋人盘剥，同时也因受到“维新运动”的震动，无可奈何由大势所趋同意“讲求新政，兴办实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朝廷开始改制，新设农工商部，以配合各省实施新政。

同年12月，赵尔巽调来长沙任湖南巡抚。赵尔巽上任后，署下各衙门官员仍旧是充满了封建腐朽习气，欲实行新政，靠这样一班官吏，当然是“断不可行”。苦于新政人才缺乏，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痛下决心“因爱重熊希龄才学”，决定冒险给予保护和起用。由于熊希龄犯有前科，起用他只能潜意渐行，故首先聘他为西路师范学堂的体育教员，为进一步的起用打下伏笔。熊希龄不了解赵尔巽的意图，对担任体育教员十分不情愿，便“求教国文，不许。又求教历史，亦不许”。他没办法只好马马虎虎地教了一个学期体育。之后赵尔巽召见了熊希龄，委任他为西路师范学堂的监督，并着他兼拟一个“整理湖南财政意见书”。文章拟好后，赵尔巽十分满意，倍加赞许。

后来赵尔巽将其介绍给端方、载泽，并极力撮成熊希龄认载泽为“义父”。载泽是皇亲国戚，名重一时的朝廷大员。这样再由载泽保奏，熊希龄“永不叙用”的处分方才得脱。此时，熊希龄才始知赵尔巽



图1-3 陈宝箴（1831—1900），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咸丰举人，1895年任湖南巡抚，锐意革新，支持谭嗣同、熊希龄等推行新政，使湖南维新风气大开，成为全国的榜样。戊戌政变后被革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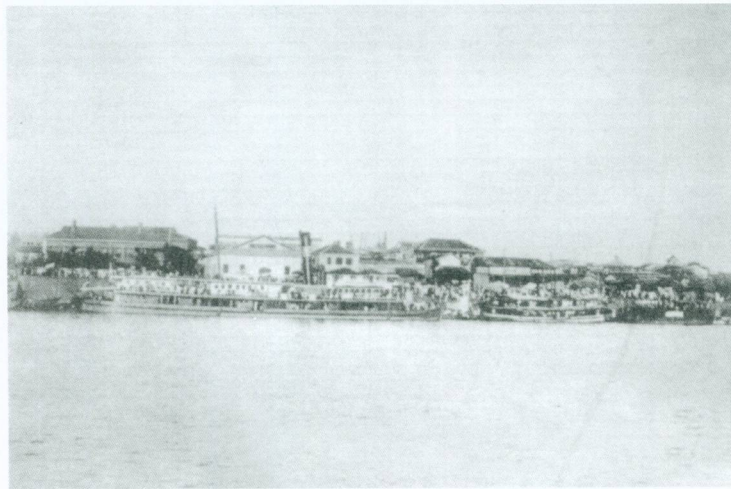


图1-4 1904年7月1日，长沙正式开埠，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进入长沙。图为日本在长沙开设的日清码头和停靠的“沅江丸”轮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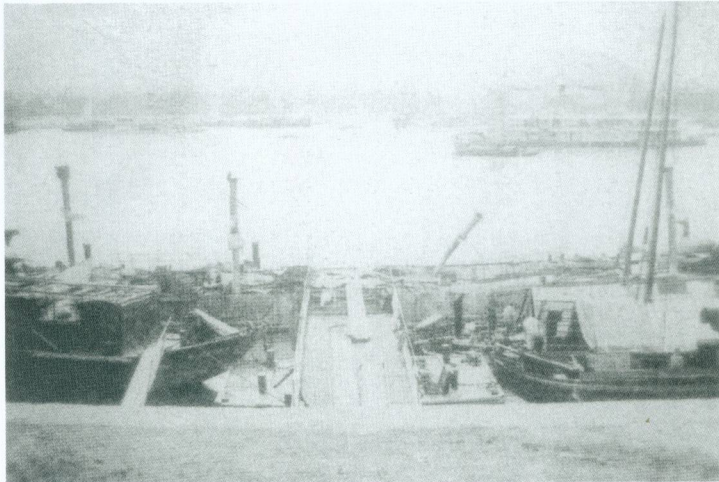


图1-5 1905年，英国设在长沙湘江边上的太古洋行趸船。



图1-6 赵尔巽，(1844—1927)，字公夔，号次珊，汉军正蓝旗人。同治进士。1903年署湖南巡抚，锐意新政，支持熊希龄兴办实业，后历任户部尚书，盛京将军，湖广、四川、东三省总督等职。民国成立后，主持编纂《清史稿》。



图1-8 晚清时期醴陵县的“贞孝节烈总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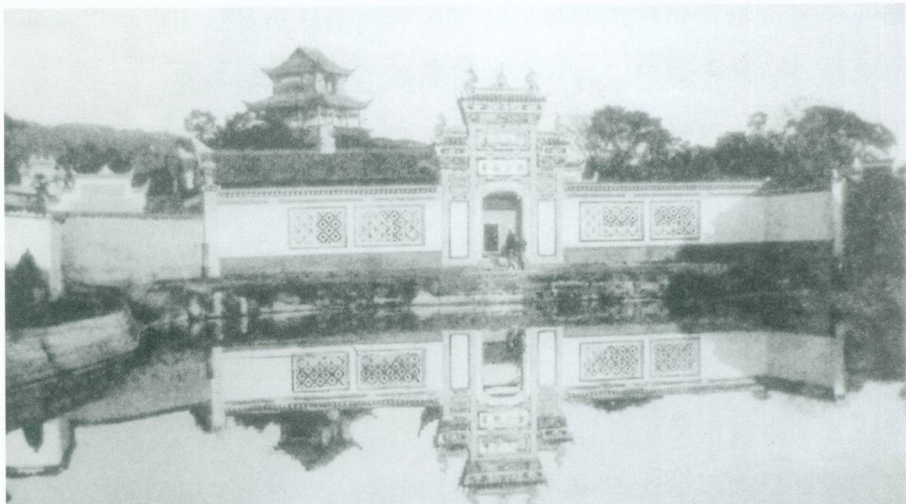


图1-7 晚清时期醴陵县的文昌阁。

的一番苦心，当初不许他教国文和历史是怕他又惹出祸端。赵尔巽就是这样保护熊希龄，将他培养成中国财政官房学派的专家，最终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以熊希龄的才华和赵尔巽的提携，这种难得的情谊也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图1-6）

赵尔巽湖南巡抚一职做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奉旨调回京城，署户部尚书。由陆元鼎接任湘抚一职。

赵尔巽离开湖南时叮嘱熊希龄，一定要在教育 and 实业方面有所建树，国家今后必然需要这方面的人才。熊希龄为赵尔巽的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

熊希龄有个同科举人文俊铎，字代耕，曾以一等知县候补湖北，由于为人清高，耻于官场交往的庸俗风习而没有授过实缺。他是醴陵人，常与熊希龄谈及身世，每逢谈及他的家乡，总要提到遍山的瓷土不能够很好利用来造福乡里，显得无奈而可惜。（图1-7、图1-8）随着交往的密切，他们逐渐意识到时局对实业的提倡是个机会，但兴办实业总要与民生相关才好，于是对醴陵的瓷土资源利用有了进一步的设想。但仿效景德镇传统来制造细瓷，难以突破旧制，又联想日本洋瓷在湘倾销，虽然可恶，但其瓷质的确美观，“湖南士绅喜用洋式杯盘”。可见新式瓷器还是迎合了人们的心理爱好。他遂决定去日本实地考察，看看有没有引进日本瓷业生产技术的可能。随着这个念头的日益增强，1904年9月，赵尔巽离湘后不久，熊希龄赴日考察教育和实业，实际以重点考察日本瓷业为主。赴日期间他见到了杨度和梁启超这两位老朋友。他们不约而同支持

熊希龄兴办实业，造福乡梓。这是熊希龄第一次到日本考察瓷业。

当时由于“明治维新”的推动，日本政治、经济、工业等方面发展都大见成效。在短时间内已经由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一跃而为世界列强。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工业生产，使他大开眼界，“甚为感悟”。在考察日本教育的同时，他重点考察了日本濑户、西京锦光山、大孤菱明山及森村组等地的瓷器生产经营状况。日本的瓷器生产状况与中国大不相同，中国瓷业全部为手工制作，对窑温的监测也全凭经验而为。而日本则实现了制瓷的机械化，窑温控制更是用先进的仪器，所以成品率高，瓷质优良。（图1-9、图1-10）

熊希龄主意打定，遂与日方厂商谈妥，由日方先派一名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到湖南，以科学方法检测醴陵瓷土确可用于细瓷生产，再购买日本的制造机器、原料，并聘请日本技师来华指导办厂。瓷厂事务有了意向后他于同年12月回国。



图1-9 日本明治时期瓷瓶



图1-10 日本明治时期瓷盘



图1-11 端方(1861—1911)，字午桥，满洲正白旗人。直隶总督。1905年署湖南巡抚，拨借银两给熊希龄兴办“湖南瓷业学堂”，支持批准成立“湖南瓷业公司”。后作为五大臣之一出国考察宪政，提携熊希龄为二等参赞官随行。后任两江总督，发起“南洋劝业会”。



图1-12 土瓷青花罐

此时，陆元鼎离开湖南调任江苏巡抚，由端方接任湖南巡抚一职。

熊希龄回国后不久，日方派来一名工作经验丰富的技师，他叫安田乙吉。熊希龄待安田来到湖南，便给他配了一名醴陵籍通事（翻译），叫刘谦。随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二十九日从长沙出发去醴陵进行实地调查，五月三十日的《长沙日报》以《考求实业》文对此作了报道，称为湘省“整顿实业之始”。他们不辞劳苦、马不停蹄地深入到醴陵乡间。文俊铎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实地调研工作。在醴陵的日子里，他们几乎走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长沙《大公报》《省城窑业调查记》载文讲述“浏山的瓷土原料极其丰富，遂聘了日本技师安田乙吉，就地考察，安田用化学分析成分，才知道可以拿作顶好的瓷器”。熊希龄根据赴日和大量醴陵调研的第一手材料，进行分析、论证，终于对醴陵的瓷业振兴形成了十分系统的实施方案。

作为这一任湖南巡抚的重臣端方“思维敏捷，文理通达”（图1-11），是晚清满人中难得的“贤达官吏”。他接手湖南政务，同赵尔巽一样，对熊希龄十分赏识，放手任用。熊希龄遂正式呈交了《为

湖南创办实业推广实业学堂办法上端方书》。端方当即作了批阅，“许以次第施行”，但又从稳妥考虑“先速办一二校以观厥成”。并按照熊“呈文”中“建设学堂及实习工场亦与他项学堂不同，约需经费银一万七八千金”，在善后库银中拨借18000两，专门作为学校经费。学校定名为“湖南瓷业学堂”，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正式成立。日本方面派出了以安田乙吉为首共五人为学堂教师，指导安装试验设备，编写教材。学堂按时招生，按时开课，日籍教师起到了作用。

趁学堂正在筹办之际，熊希龄不失时机，又上书给端方，名为《为创兴醴陵瓷业呈端方文》，专文奏请成立瓷业公司。

这次端方除了看到这篇呈文而外，还同时收到了两件瓷器，这是熊希龄在醴陵实地考察时带回的现场试验品，主要为了用实物说明醴陵瓷



图1-13 熊希龄作为二等参赞官随端方、戴鸿慈等出国考察宪政时合影。中排右二为熊希龄、右七为端方、右五为戴鸿慈。

土品质之优良。（图1-12）而这两件试验品的由来却是十分有趣，引人感叹。熊希龄在日本考察期间顺便购买了一些釉药和颜料，准备到醴陵后进行实地试验，谁料想试件刚刚入窑便接到通知，马上要赶回长沙，眼看着试验品出不来，恐影响“呈文”的说服力，他非常着急。正巧有位姓廖的窑户为提高产品质量，于景德镇购回了优质釉药与本地土釉作对比试验，烧了几件试验瓷器出来，熊希龄只好权将其中两件带给了端方，并且在呈文中加上一段解释，“该山窑户有廖姓者，由景德镇购得釉药一块，施于醴陵土质制成器皿，色极洁白，与景德镇窑无异；不过器式稍粗，由于工手之钝，而其瓷质可以造画、造色，因确有把握也。原器两件，谨呈钧鉴”。这样一件小事，可见熊希龄为振兴醴陵瓷业的一番苦心，今天人们回顾这些往事，感慨之情油然而生。

端方对呈文仔细研读，认为熊希龄的呈文有根据、合情理，甚至对于生产、经营的细账都进行了分析计算，并且还用实物来说明醴陵瓷土之优良，实在是考虑得细微、周到而难能可贵。遂同意该公司由官方出面倡办，商民集股投资。

事隔一个月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端方接到朝廷旨意，命其与载泽、戴鸿慈等共五位大臣一道出洋考察宪政。他又全力保举熊希龄与袁克定等人作为随行官员，朝廷照准了他的要求，批准熊希龄以二等参赞官身份随同前往。（图1-13）

此次五大臣出洋分由两路，载泽、徐世昌、绍英为一路；端方和戴鸿



图1-14 晚清时期醴陵县老麻石街，1906年12月4日，萍浏醴起义在此爆发。



图1-15 熊希龄任国务总理时的照片（1913年）。

慈为另一路，熊希龄是端方的随员。12月19日，端方、戴鸿慈等一行人从上海乘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轮船出发，考察的第一站是日本。由于在日停留时间紧迫，熊希龄只好抽空去找日本厂商落实前次商谈关于瓷业学堂和公司的诸多事务，四处奔走，疲惫不堪而毫无怨言。这次考察的重点在欧洲，因此在欧洲各国停留时间较长，一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回国。

熊希龄回国后立即紧锣密鼓着手筹办湖南瓷业公司，并于《长沙日报》登载招股广告。这次的招股非常顺利，共招得股金5万元。熊希龄遂通知日本方面定购机器。在此期间，端方奉旨调任两江总督。

招股成功后，熊希龄又于当年11月25日以考察水利和商务的名义再次赴日，其主要为敦促日方办理瓷业公司机器和原料事宜。这一次他又在神户见到杨度和梁启超。1907年1月9日回到上海。所购机器、原料随后如期抵达醴陵。（图1-14）

由于一开始没有建厂经验，不久瓷业公司发生资金困难。他又积极奔走宣传，号召扩股，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长沙日报》上再次广告招股，又招得股金5万元，使公司及时得到发展。

在此之后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熊希龄官运亨通，一年五迁。先是两江总督端方委为督署总文案，之后又是李经羲保为云南巡警道等职，最后还是载泽、赵尔巽保举朝廷恩赏四品卿衔，任东三省清理财政监督官、盐运使、大清银行总办及屯垦局局长。后来民国成立，熊希龄在袁世凯任大总统时出任总理（图1-15）。卒于民国26年（1937年），葬于香港，后迁葬北京。

熊希龄自1908年离湘后，虽政务繁忙，但仍然时常挂念亲手组建的瓷业公司和学堂事务，每次回湘都要过问瓷业进展，从来不曾忘却。他不愧是醴陵近代瓷业的奠基之人，直到今天仍为醴陵瓷业界人士缅怀。